

斯文·赫定、袁同礼与国立北平图书馆

——以瑞典国家档案馆藏“斯文·赫定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王新春

摘要 瑞典国家档案馆藏“斯文·赫定档案”的研究表明斯文·赫定与袁同礼的关系密切,他们在20世纪20—40年代围绕着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往来和交流频繁。在袁同礼的推动下,国立北平图书馆与瑞典学术机构和学人有着二十余年的交流与合作。档案的研究,展现了少为人知的中、瑞学术交流细节,为国家图书馆史、袁同礼等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参考文献61。

关键词 斯文·赫定 袁同礼 国立北平图书馆 图书征集 国际援助

Sven Hedin, Yuan Tongli and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A Study Centered on “Sven Hedin Archives” in the Swedish National Archives

Wang Xinchun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Sven Hedin Archives” in Swedish National Archives shows that Sven Hedin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Yuan Tongli. They had frequent contacts and exchanges around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from the 1920s to 1940s. Driven by Yuan Tongli,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has had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Swedish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scholar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The study of archives shows the little known details of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Sweden, and provides new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and Yuan Tongli. 61 refs.

Keywords: Sven Hedin; Yuan Tongli;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Book Collection; International Aid

瑞典国家档案馆藏“斯文·赫定档案”(Sven Hedin Archives)拥有3000余件“中国通信”(Correspondence China),显示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近半个世纪的探险生涯中与中国学术界有着广泛的交往,其中包括62件与中国图书馆学家袁同礼有关的英文、德文、瑞典文书信等档案,从未见披露。这些档案涵盖了1926年12月9日至1947年10月7日这一时间范围,反映了袁同礼从北京图书馆至国立北平图书馆任职期间的一

段经历^①,内容极为丰富。它们不仅表明斯文·赫定与袁同礼有着二十余年的交往历史,也展现了二人在日常生活、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抗日求援等多个方面有着密切的交流,是袁同礼、中国国家图书馆史等研究非常重要而独特的海外史料。

1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时期的交往

斯文·赫定是近代在中国西北探险的西方探险家中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晚清时期便与

*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重大研究专项“瑞典藏中国边疆考古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18VJX107)的研究成果之一。

① 与斯文·赫定交往期间,袁同礼任职的图书馆机构和名称数次变更,现略作梳理。1909年,清政府筹立京师图书馆,1926年更名国立京师图书馆,1928年更名国立北平图书馆。袁同礼任职的图书馆为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建立的北京图书馆,1928年更名北平北海图书馆,1929年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合并改组为国立北平图书馆。袁同礼致斯文·赫定的信笺标有北京图书馆(1926—1927)、北平北海图书馆(1929)、国立北平图书馆(1930—1936、1947)、国立北平图书馆长沙办事处(1937),反映了他任职机构变迁的情况。本文为行文方便,将描述二人交往整体时间段袁同礼任职的图书馆统称为“国立北平图书馆”。

西藏、新疆诸多地方官员颇有交往,1926—1935年在中国考察期间与中国学术界有着广泛往来。1926年10月,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Gustaf VI Adolf)访问中国,将斯文·赫定的中国西部科学考察报告《西藏南部》作为重要礼物赠予中国学术界,并保存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立的北京图书馆^[1]。10月22日,北京图书馆正副馆长梁启超、李四光受邀参加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为王储举办的学术会议和宴会,知晓斯文·赫定将赴中国探险^[2],此即袁同礼、国立北平图书馆与斯文·赫定交往、交流之渊源。

1.1 二人的结识与往来

袁同礼是1926年斯文·赫定抵达北京后较早结识的中国学人之一。11月20日,斯文·赫定为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抵达北京。有了瑞典王储所做“铺垫”和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的引荐,北京学术界对他礼遇有加。12月9日,梁启超、李四光、袁同礼联名邀请斯文·赫定于11日中午1点至北海公园北京图书馆参加午宴^[3]。12月17日,袁同礼致信斯文·赫定,询问他是否收到了午宴结束时汉学家钢和泰男爵(Baron Stael-Holstein)错拿的手杖,并提醒之前双方约定于18日至北京图书馆参访,表示届时将亲至他下榻的六国饭店迎接^[4],二人自此开始频繁交往。

袁同礼自与斯文·赫定结识,便一直与之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1927年5月9日,斯文·赫定率西北科学考查团赴新疆考察,1929年1月返京,至1933年9月一直以北平为中心活动,袁同礼与他的会面和通信在这一时期最为频繁。他们经常在对方的宴会邀请名单之内,二人之间的往来书信内容从工作到生活、从学术到政治、从家庭到国事等无所不谈。他们之间密切的关系,尤其体现在袁同礼对斯文·赫定生日等生活细节的重视上。1930年2月19日,袁同礼等人在南河沿南口的欧美同学会为斯文·赫定筹办65岁生日宴会^[5],并在此后数年他的生日时,或是

举办宴会或是致电祝贺^[6]。斯文·赫定感动于袁同礼的礼遇,与之通信和往来愈加频繁。这种友好关系,一直延伸至他们的个人交往圈子。因斯文·赫定的引荐,袁同礼同瑞典驻北平外交官员颇有往来,并与多位西北科学考查团外国成员交往频繁,经常邀请他们至国立北平图书馆参加各种活动。斯文·赫定也在袁同礼带领下,见到了一些不常见的人物。如1930年4月12日下午,袁同礼陪同他拜会了赋闲在家的晚清边疆重臣张荫棠^[7],后者曾在1907年4月将他逐出西藏日喀则。

因为斯文·赫定的关系,袁同礼的海外交往圈子扩展至瑞典。1934年2月,袁同礼为考察世界文化图书事业出访欧美。8月24日,他在柏林听闻斯文·赫定正在返回斯德哥尔摩途中,遂致信斯文·赫定的妹妹阿尔玛·赫定(Alma Hedin),称将在8月31日至斯德哥尔摩拜访斯文·赫定和其他瑞典朋友^[8]。阿尔玛对兄长的中国好友即将来访极为热心,立即发电报询问他往返的具体时间,并联络瑞典诸人接待^[9]。31日8点45分,袁同礼抵达斯德哥尔摩,先至斯文·赫定家中接受赫定家人的款待^[10],然后在阿尔玛·赫定的陪同下,见到了他的好友瑞典艺术史家喜龙仁(Osvald Sirén)和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孟德录(Gösta Montell)、霍涅尔(Nils Hörner)、布林(Birger Bohlin)等人,并前往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作了一天行程密集的参访,于晚上7点返回柏林^[11]。尽管袁同礼在论著中从未提及他唯一的一次瑞典之行,但是他曾数次谈到瑞典民族学博物馆^[12]、国家博物馆和东方博物馆^[13],说明瑞典一日行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2 共同参与西北科学考查团事务

西北科学考查团是斯文·赫定与袁同礼在工作上唯一的交集。1927年3月5日,袁同礼代表中华图书馆协会参与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随后又成为中瑞合作组建的“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理事会理事参与考察事务,斯文·赫定则以外方考查团长的身份主持野外考察。他们除了谈论

袁同礼的兄长袁复礼在新疆的考察外,在考查团事务上也颇有交流。

斯文·赫定一直将获取中国西北地区的科学材料作为考察的重要目的。1931年5月,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olke Bergman)结束在额济纳地区的考古,将考古采集品运回北平,其中居延汉简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保管。斯文·赫定随即谋划将瑞典学者所获考古采集品运至瑞典研究,于是先向袁同礼询问汉简情况。袁同礼多次在书信中详细介绍了居延汉简的研究情况;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资助研究经费,国立北平图书馆提供了一个大房间给中国学者工作使用,负责研究工作的马衡和刘复每周至图书馆三次^[14],“在进行研究之前,有许多初步的整理和拍照工作需要木简上完成”^[15]。

袁同礼表明居延汉简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已得到妥善安置和有序研究,这或许是斯文·赫定暂时放弃居延汉简的重要原因^①。随后斯文·赫定又求助袁同礼劝说中方将贝格曼所获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存赠予瑞典。袁同礼并未直接拒绝,他表示理解斯文·赫定的诉求:“瑞典承担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部分费用,如果在故乡没有什么可展示的,那对你来说会很尴尬”,但他也指出根据中国文物保护法律规定,“也许将所有采集品都交给瑞典是不可能的,但我相信可以做出一些安排,以满足您的愿望和政府的规定”,需要“有辩证的技巧”^[16]。1935年2月,斯文·赫定不再要求赠予古物,转而希望通过合法的形式借至瑞典研究。据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保存的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会议录,袁同礼认为斯文·赫定借出古物一事应交给政府定夺,“赴京时报告关系机关及当局备案”,获理事会的支持^[17]。他在中、瑞之间考古采集品的分配问题上提出了最

切实的意见,对近代规模最大的中国西北考古材料的合法外借具有重要影响^②。

受斯文·赫定、西北科学考查团影响,袁同礼对同时期其他西方探险家在中国西北的探险活动也十分关注,并与斯文·赫定进行了交流。他对近代以来西方探险家中国西北考察活动的殖民主义气息以及所具有的欺骗性和非科学性有深刻的认识,指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向南京国民政府作了不做发掘的保证,但在抵达新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金树仁申请考古发掘,遭拒绝后又盘桓数月私下发掘^[18];中法学术考察团虽有中方邀请的法国学者德日进(Pere Teilhard de Chardin)参与,但该考察团的目标并不在学术^[19];至于美国中亚探险队的“安德鲁斯博士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但“他对中国人的态度太霸道了”,“一再讥讽中国人,并把探索蒙古的唯一权利强加给自己”,“没有人愿意和他有任何关系”。袁同礼认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奥斯朋(Henry Osborn)公开支持安德鲁斯,无疑是“对安德鲁斯博士这一面一无所知”^[14]。

近代西方探险家中国西北考察造成的文物及科学材料外流,素为中国学人所警觉。袁同礼虽秉承开放的态度支持西北科学考察的中外学术合作,但却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探险家在中国境内的非法活动,在遵守中国国家主权、法律法规和文物及科学材料归属中国等原则性问题上的态度十分明确,这也是他虽与斯文·赫定交好却参与对其考察的“保存古物运动”^[20]的重要原因。

2 斯文·赫定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

通过“和国外图书馆界和汉学家建立的公私

① 在居延汉简从国立北平图书馆运至北京大学后,斯文·赫定似乎又重新燃起了对它的兴趣,此后十余年,他一直向袁同礼打听居延汉简的情况,并劝说后者协助将居延汉简运至瑞典研究和出版。袁同礼在信中经常提及居延汉简的下落及研究情况,并将他的建议转达给主持汉简研究工作的傅斯年等人。

② 1935年,斯文·赫定向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提出,将瑞典学者贝格曼在额济纳等地考古发掘所获约5万件古物借至瑞典斯德哥尔摩整理研究,计划1939年归还。经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各部门批准,这批古物于1937年通过海路运送至瑞典。

友谊”^[21],宣传国立北平图书馆并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是袁同礼发展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方式,这也是他与斯文·赫定交往的主要目的。袁同礼经常邀请斯文·赫定及其他瑞典学者至国立北平图书馆参加宴会^[22]、品茗、参观颐和园建筑模型等^[23],他们的通信内容乃至信笺用纸也大多与国立北平图书馆有关。在袁同礼的推动下,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启了与斯文·赫定及瑞典图书馆界二十余年的合作与交流。

2.1 征集斯文·赫定及瑞典学术著作

西方学者的东方学著作一直是袁同礼征集图书的重点,与斯文·赫定的交往则进一步促使他关注西方探险家在中国西北乃至中亚的科学考察活动,并推动国立北平图书馆广泛搜集中国和中亚、波斯探险的论著,对斯文·赫定著作的征集更是长达二十余载。

1927年初,斯文·赫定谈论他在中国西北及中亚、波斯等地的探险经历时,承诺向北京图书馆赠送探险著作,引起了袁同礼的极大兴趣。3月2日^[24]和8日^[1],袁同礼两次致信斯文·赫定,询问他答应赠送的关于楼兰和波斯的两部德语著作,并言可以亲自来取。袁同礼将西方探险家考察报告作为图书馆西文著作征集的重点,当以此为开端。至1928年5月,北京图书馆收藏的“考古学重要报告”就包括斯文·赫定等“西人在中亚细亚及新疆考古之报告”^{[25](81)}。

袁同礼在20世纪20—40年代三次向斯文·赫定征集著作。第一次是在北平北海图书馆。1929年4月,时任北平北海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告诉斯文·赫定:“在过去的两年,北平北海图书馆一直在收集您的珍贵作品。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获得了其中的11种。”“您的探险非常重要,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您所有的出版物都保存下来,以便中国学者可以在这里随时查阅”,并提出希望他提供一份著作目录作为北平北海图书馆收藏的依据^[26]。斯文·赫定随即提供了20余种该馆尚未收藏的他的早期著作目录^[27],并随后赠送了4种著作。

第二次是在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9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为国立北平图书馆,袁同礼担任副馆长。1931年,斯文·赫定开始向国立北平图书馆赠送西北科学考查团著作。1936年,袁同礼得知斯文·赫定将向国立北平图书馆赠送他返回瑞典后的第一部著作《大马的逃亡》,立即回信致谢:“让您以这种方式记住我们确实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并希望他尽可能完整地寄出国立北平图书馆还未收藏的著作^[28]。据随附清单,193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有斯文·赫定德文、法文、英文、瑞典文等著作34种^[29]。1937年,斯文·赫定及出版商先后向国立北平图书馆寄出著作33种。另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统计,斯文·赫定在1936—1937年总共赠送论著37册^[30]。1938—1939年,斯文·赫定在抗日战争期间通过德国陆续寄出了《德国五十年》《德国和世界和平》等著作^[31]。1941年,他尝试通过西伯利亚将著作寄往中国未果^[32],又经美国海运至上海,但大多在中国境内遗失,国立北平图书馆仅收到一卷《雍和宫》^[33]。

第三次是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复原后。1945年底,袁同礼主持恢复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计划“积极征购国内外新出版之图书”^{[25](369)}。1947年8月22日,他写信给斯文·赫定和瑞典驻华使馆,称“我们现在正在继续系统地收集科学文献。我们希望更多的瑞典出版物寄往中国,特别是英文和法文印刷的出版物,以促进两国学者之间更密切的交流”,请他们将战争期间出版的《斯文·赫定博士领导下的中国西北诸省科学考察报告集》挂号邮寄给国立北平图书馆,并表示愿意支付邮资^[34]。斯文·赫定随即应允,称将补寄战争中遗失的部分^[35]。但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和袁同礼赴美国,此次图书征集最终未能完成。袁同礼二十余年的斯文·赫定著作征集活动,除早期阶段购买过一部分,大部分为斯文·赫定的捐赠,以德文著作为主,另有瑞典文、法文、英文等,它们构成了如今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斯文·赫定论著的主体。

除征集斯文·赫定个人论著外,袁同礼还希

望通过斯文·赫定推动中国与瑞典图书馆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他多次表示国立北平图书馆对“自然科学和精确科学有特殊的兴趣”^[15],尤重海外“学术团体的出版物,特别是在物理、自然和历史科学方面的出版物”征集^[19]。1931年,斯文·赫定推荐了两种瑞典学术刊物《Ymer》和《地理学年鉴》^①,袁同礼听完介绍后认为“这两本重要期刊的完整版将对中国地理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学生有更好的服务”^[36],请他帮忙联络瑞典皇家科学院和皇家地理学会购买。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期刊,“举凡东西洋学术上重要之杂志,力求全份”^[37],因获取这两种期刊的过刊难度颇大,袁同礼随即表示可以放弃全刊^[19],但斯文·赫定凭借其影响力很快便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等机构的鼎力支持。当袁同礼得知瑞典方面将向国立北平图书馆赠刊时,立即致信斯文·赫定:“国立北平图书馆非常感谢外国机构提供的宝贵礼物,其中瑞典科学院尤为突出。我希望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中使用这些出版物将有助于推动科学发展”^[16]。1932年5月28日,瑞典寄出的6箱书刊经哥德堡运至上海,于9月抵达国立北平图书馆^[38]。《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亦记录了1932—1933年该馆获赠重要西文书籍4018册,包括“瑞典各学术机关赠送科学书籍六箱,系斯文·赫定博士代予接洽,由各学术机关赠送本馆者”^{[25](228)}。

2.2 参考咨询服务

1929年7月,斯文·赫定获瑞典裔美国企业家文森特·本迪克斯(Vincent Bendix)资助,计划在中国购买两座藏传佛教寺庙运往美国芝加哥和瑞典斯德哥尔摩保存,并围绕该项目从事民族学考察与研究。斯文·赫定不熟中文,对中国历史亦缺乏深入了解,中文文献资料的搜集和翻译便求助于袁同礼,国立北平图书馆因此为他提供了历史学、民族学等方面的参考咨询服务。

1930年初,斯文·赫定计划围绕承德避暑山

庄撰写一部关于清朝历史的通俗读物,向袁同礼求助中文史料。袁同礼帮他向国立北平图书馆借出4卷《热河志》^[39],协助他购买了一套保存完好的《承德府志》^[40],请国立北平图书馆为之查阅清史资料并翻译成英文。斯文·赫定提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顾先生”协助查找资料和翻译了6—8章所引中文文献^[41],以及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1933年的咨询条目“关于乾隆小传之目录”“热河避暑山庄史料目录”反映的均是此事^{[25](218-219)}。“顾先生”即精通英文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员顾子刚^[42],袁同礼在1930年3—4月间委派他协助斯文·赫定搜集、翻译《钦定热河志》、《清实录》和《大清通历》等著作中的乾隆皇帝的传记、西藏与藏传佛教史、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等内容,“每周不超过15小时”^[43],一直持续到8月才结束^[44]。斯文·赫定与顾子刚也因此颇有书信往来。此外,在斯文·赫定撰写著作期间,袁同礼多次向他提供故宫建筑等照片作为插图^[14,45]。正是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全力协助下,斯文·赫定才得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帝王之都——热河》一书。

在购买寺庙一事上,袁同礼亦多次向斯文·赫定施以援手。他先是邀请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提供协助,之后又对斯文·赫定以复制承德外八庙的普陀宗乘之庙主殿“万法归一殿”的方案代替购买的决定表示支持和鼎力协助^[46]。寺庙的复制工作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建设顾问安那(C. W. Anner)推荐建筑师梁卫华负责^[47],由其组织工人制造了约3万个木质部件,于1933年运抵美国芝加哥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组装后展出^[48],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应斯文·赫定的请求,袁同礼承诺全力协助瑞典学者的民族学考察,为寺庙展览陈设物品提供参考意见^[19],并多次向孟德录赠送藏传佛教相关图像资料^[45]。可以说,斯文·赫定的著作撰写、寺庙主殿复制工作及其相关民族学考察研究,袁同礼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服务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① 《Ymer》和《地理学年鉴》均为瑞典人类学和地理学学会出版的学术期刊,分别创刊于1881和1919年。

3 瑞典对中国的国际援助

作为在近代帝国主义入侵、军阀混战等民族危亡、内忧外患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学人,袁同礼心系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学术救国为念,一方面筹划迁移珍贵图书,另一方面则在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的同时向国际社会请求援助图书,在文化战线上做出了重要贡献^[49]。斯文·赫定总在第一时间积极响应袁同礼的呼吁与求援,20世纪30—40年代瑞典社会各界也在他的影响下积极支援中国。

3.1 赈济水灾

袁同礼与斯文·赫定身处政治、社会剧烈变革的中国,他们关注并时常谈论政治局势和时事。1931年的中国多灾多难,华北地区中原战争结束不久,华中地区又遭遇了江淮特大洪水。中国社会各界倾囊相助,国立北平图书馆亦组织书籍义卖筹款救灾。8月21日,袁同礼忧心忡忡地向斯文·赫定说道:

华北的战事很快被平息,这片地区极有可能实现和平。但是史无前例的洪水正在华中地区造成巨大的破坏。我的国家真的是最不幸的,因为我们没有人为的灾难,我们有自然的灾难^[19]。

1931年8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于上海特设临时机构救济水灾委员会,向国际社会发出求援信^[50],斯文·赫定大概在袁同礼来信同一时期也收到了此信。他在捐资的同时,向瑞典呼吁成立救济中国水灾委员会,动员社会各界捐助财物运往中国,并积极营救在瑞典呼吁救助中国水灾时被瑞典政府以煽动劳工运动罪名逮捕的国际工人救济会^①中央委员会秘书保罗·肖尔泽(Paul Scholze)^[51],瑞典也成为最早向中国伸出援手的国家之一。斯文·赫定为救济江淮特大洪水灾难做出了重大贡献,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肯定和感谢。1932年4月,财政部长、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向他致信,“您慷慨地为国际救济水灾委员会捐款”,“从斯德哥尔摩收到

两笔可观的汇款”让身处灾难中的中国人深受鼓舞,感谢他和他的委员会同事以及瑞典的捐赠者的帮助^[52]。救济水灾委员会灾区工作组主任、辛亥革命元老朱庆澜亦表示“感谢您为救济水灾受难者筹集了大笔资金”,并保证资金将妥善使用^[53]。

3.2 抗日求援

就在世界各国为赈济中国灾民协力合作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的野心彻底暴露。袁同礼在1931年9月25日给斯文·赫定的信中写道:

日本人这一次肯定走得太远了,甚至比他们自己的外交部批准的还要远。局势充满了危险,我看不出每天出现的复杂局面会有什么结局。无端的袭击完全出乎意料,政府正采取谨慎的政策。尽管日本在西方有非常好的宣传机器,但事实如此,我相信世界不会被愚弄^[14]。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北平、上海、南京等地先后沦陷。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的书籍有不少毁于战火和沦于敌寇之手,播迁至南方的教育、科研机构图书资源极为匮乏。袁同礼遂以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之名义向海外征集图书,“力谋恢复各馆度藏”。他在美、英等国“声名素著”,呼吁这些国家的友人协助,“理所当然,也自易获得他们的热烈反应”^{[25](319)}。因为斯文·赫定的关系,瑞典也成为他最早联络求助的国家之一。

1937年11月11日,斯文·赫定担忧中国的战争局势,致信袁复礼、袁同礼兄弟表示慰问^[54]。袁同礼在回信中请斯文·赫定向瑞典图书馆协会主席转交图书请援信,并希望他在瑞典新闻媒体发声,呼吁瑞典社会向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提供支持帮助。书信主要内容翻译如下^[55]:

毫无疑问,您听说过很多关于日本武装侵略中国的事情。我相信你们在远东的记者已经让瑞典公众很好地了解了这里的事态发展。但由于他

^① 国际工人救济会(IAH)是共产国际发起的国际工人救助组织,总部最初设置在柏林,各国设有分支机构。

们驻扎在大城市,几乎没有关于内陆情况的报告。中国平民遭受侵略者之苦最深的就是偏僻的地方。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无差别空中轰炸。而且我们可以想象,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成功将他们自我扩张的行径合理化,努力推动到了何种恐怖的程度。

虽然在中国发生的恐怖事件是现代战争的必然产物,但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无辜的非战斗人员在历史上肯定是绝无仅有的。但迄今为止,这种蓄意的残暴行径未能引起世界舆论的抗议,更不要说采取积极行动了。

根据最近的一份报告,在中国除了许多主要的图书馆外,有30多所国立和私立大学已被完全摧毁或瘫痪。许多图书馆和实验室的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拿走了。许多机构发现在最艰难的情况下无法正常运作,不得不从日本侵占的区域撤离。它们被迫放弃自己的工作,一切从头开始。

在我们的恢复工作中,我们期待着外国力量的帮助。谨随函附上一封致瑞典图书馆协会主席的呼吁信,如果您愿意为我们提供必要的联系,我将不胜感激。如果您能在各种瑞典报刊上发表声明,那将极大地帮助我们的事业。

这封书信展现了袁同礼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局面下,如何通过国际友人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真相和对中国人民的残酷暴行,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与支持。因为二人的密切关系以及斯文·赫定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袁同礼在信中详细地说明了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的累累恶行,而且“为了给您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中国大学是如何被掠夺的,我附上了国立清华大学温德教授的报告”^[56]。温德(Robert Winter)教授系清华大学平校保管委员会成员,他的报告和日记翔实地记录了侵华日军在北平沦陷期间肆意窃取和破坏清华大学校产的情况。斯文·赫定收到回信后,立即将请援信转交给瑞典国家图书馆馆长艾萨克·柯林(Isak Collijn)博士,他们多次讨论如何援助图书并运往中国。此外,他还在1938年1月29日的书信中告诉袁同礼,瑞典各界为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筹集物资运往中国,芬兰也即将做同样的事情。

情况很糟糕。整个瑞典民族都对中 国表示同情。上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在瑞典各地收集钱、亚麻布、衣物、伤员绷带等。在呼吁下签名的人包括乌普萨拉大主教、几位主教、教授、工业界人士、高级官员、高本汉博士、拉格雷留斯博士、孟德录博士、魏斯曼教授(主席)、斯文·赫定和许多其他人^[57]。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中国与瑞典之间的邮路不畅,斯文·赫定与袁同礼的联络愈加困难。他们身处世界的两端,在自己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力量。斯文·赫定向国际社会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58],他一直坚信中国人民必将战胜日本侵略者,“中国将永远取得胜利,尽管她可能会度过艰难的时期”^[59]。

4 结语

1935年3月27日,斯文·赫定离开中国,结束了50年的探险生涯,此后与袁同礼再无会面。1946年2月底,袁同礼赴欧美采购图书,曾计划至瑞典拜访斯文·赫定,但由于无暇脱身而未能如愿^[34]。同年,史学家陈垣赴斯德哥尔摩参加国际笔会年会,拜访了斯文·赫定等瑞典学者^[60],归国后特意告知袁同礼斯文·赫定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让他感到非常高兴^[34]。1947年10月7日,斯文·赫定向再次陷入战争的袁同礼感慨道:“我希望您和所有家人以及袁复礼博士一切都好,尽管世界看起来前所未有的颠覆”^[61]。随着解放战争的持续,二人彻底断绝了通信。

虽然斯文·赫定与袁同礼在论著中极少提到过对方,但“斯文·赫定档案”中的书信等内容显示他们有着二十余年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广阔的学术视野、共同的学术兴趣、对知识的崇敬和对人格魅力的欣赏,大概是吸引袁同礼与斯文·赫定结识与交往的原因,对中国的热爱和国际主义精神是巩固二人友谊的纽带,而国立北平图书

馆(包括其前身)则是维系和推动他们二十余年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因素。斯文·赫定和袁同礼关于图书征集、咨询服务、图书请援等方面的合作,意味着他们二十余年的交往实际上是围绕着国立北平图书馆(包括其前身)进行。国立北平图书馆与斯文·赫定乃至瑞典图书机构的合作完全源自于二人的私谊,这在20世纪30—40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发展史上颇为特殊,同时也凸显了袁同礼在其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参考文献

- 1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27年3月8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2 Romgard J. Polarforskaren som strandade i Kina [M]. Stockholm: Fri Tanke, 2018: 309-319.
- 3 梁启超,李四光,袁同礼致斯文·赫定请柬(1926年12月9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614.
- 4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26年12月17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5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30年2月12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6 刘复,徐炳昶,袁同礼致斯文·赫定电报(1931年2月16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7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30年4月11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8 袁同礼致阿尔玛·赫定书信(1934年8月24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9 阿尔玛·赫定致袁同礼电报(1934年8月27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10 阿尔玛·赫定致袁同礼书信(1934年9月14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11 袁同礼致阿尔玛·赫定书信(1934年9月6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12 袁同礼.十年来欧美文化事业之进展[J].刘大洲,记.磐石杂志,1935(2):118.
- 13 袁同礼.袁同礼文集[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282.
- 14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31年9月25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15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31年8月5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16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31年10月26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17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会议录[A].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796.7/10(特).
- 18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31年6月9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19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31年8月21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20 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194-195.
- 21 钱存训.纪念袁同礼先生[G]//国家图书馆.袁同礼纪念文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4-5.
- 22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30年8月16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23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30年6月17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24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27年3月2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25 李致忠.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上)[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 26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29年4月18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27 北平图书馆收藏斯文·赫定著作目录草稿(1929年4月18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28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36年11月18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29 国家图书馆的斯文·赫定作品(1936年11月18日)[A].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30 彭福英.袁同礼与北平图书馆的西文建设[G]//国家图书馆.袁同礼纪念文集.北京:

-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147.
- 31 1939年5月发送至北平清单[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32 斯文·赫定致袁同礼书信(1941年1月14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33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47年9月25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34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47年8月22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35 斯文·赫定致袁同礼书信(1947年9月5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36 袁同礼致孟德录书信(1931年7月3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37 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下册)[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1202.
- 38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32年9月14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39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30年2月24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40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30年3月1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41 斯文·赫定. 帝王之都——热河[M]. 赵清,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3.
- 42 赵爱学,林世田. 顾子刚生平及捐献古籍文献事迹考[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2(3):94-101.
- 43 顾子刚致斯文·赫定书信(1930年5月1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1.
- 44 顾子刚致斯文·赫定书信(1930年7月26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1.
- 45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31年8月31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46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30年12月7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47 Hedin S.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art 2[M]. Stockholm: Elanders-boktryckeriaktiebolag, 1943:97.
- 48 Montell G. the Chinese lama temple; Potala of Jehol[M]. Chicago: The Lakeside Press, R. R. Donnelley & Sons co., 1933:15.
- 49 罗益群. 抗战时期的袁同礼先生[J]. 图书与情报,1996(1):74-75.
- 50 政府设立的救济水灾委员会:应对洪水灾害[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2.
- 51 国际工人救济会致斯文·赫定书信(1931年9月13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2.
- 52 宋子文致斯文·赫定书信(1932年4月18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3.
- 53 朱庆澜致斯文·赫定书信(1932年4月18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18.
- 54 斯文·赫定致袁同礼书信(1937年11月11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55 袁同礼致斯文·赫定书信(1937年11月29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56 温德教授报告与日记(1937年10月11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57 斯文·赫定致袁同礼书信(1938年1月29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58 斯文·赫定致袁同礼书信(1939年12月31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59 斯文·赫定致袁同礼书信(1941年7月2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541.
- 60 斯文·赫定致陈垣书信(1946年6月5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61 斯文·赫定致袁同礼书信(1947年10月7日)[A]. 瑞典国家档案馆,斯文·赫定档案:424.
- (王新春 副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

收稿日期:2022-12-31